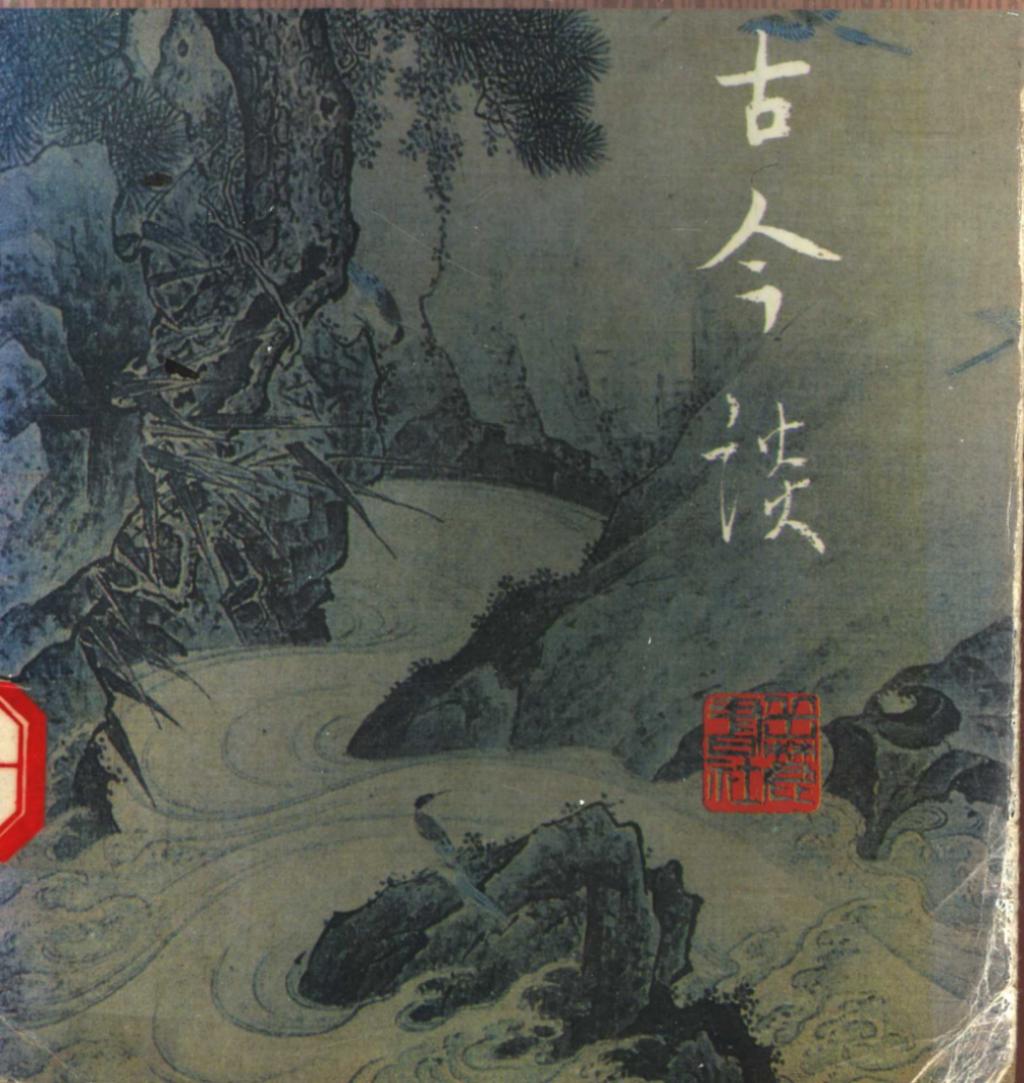


葉嘉莹
缪钺

著

詞學古今談





ISBN7-80520-358-X
I · 205 定价：6.60 元

缪
葉嘉莹

著

詞學古今談



书名题签 缪 钺
责任编辑 潘运告
曾果伟
封面设计 胡 纶

词 学 古 今 谈

缪 钺 叶嘉莹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张:12.25 印数:1—1,500

ISBN7—80520—358—x

I·205 定价:6.60元

〔湘岳 92—13—2〕

湘新登字 007 号

序

葉嘉瑩

早在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了四川大学缪钺教授与我合撰的《灵谿词说》一册，现在所出版的《词学古今谈》，实为前书之续编。不过我们却换了一个新的书名，而且内容与体例也都与前书有了相当的不同，现在我就将把我们何以做了这些改变的原因及经过，略加叙述。

关于缪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灵谿词说》一书之动机及经过，我们在《词说》之〈前言〉与〈后记〉中，都已曾有过颇为详细的说明。原来《词说》一书之撰写以及撰写之体例，一切盖皆出于缪先生之倡议。我与缪先生相识于一九八一年春在成都草堂举行的杜甫学会首次年会之中，当时国内已早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了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一书，先生读后认为我论词之见解与先生颇有相合之处，遂提出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又因先生曾经写诗相赠，我亦曾写诗奉答，先生见我于撰写论文之余亦从事诗词之创作，内心尤深赏契，遂又提出了以论词绝句与理论文字相结合之撰写方式。而我于四十年前初读先生《诗词散论》一书之时，即已对先生深怀仰慕，而今既幸得相遇，更蒙知赏，复得合作之机会，感谢之余，遂欣然奉命。及至出书之际，则据上海古籍友人相告云各地新华书店对此书

征订之册数甚少，此或由于此书之题名及撰写之体例皆不免过于古雅之故。盖当时正值国内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乃不免有一种崇尚新异之风气。记得我于一九八六年秋回国讲学时，就曾有几位相熟的友人先后劝我在讲授古典诗词时，最好能增入一些新说及新义以提高学生们学习古典文学之兴趣。当时《词说》一书既已结集，即将出版，缪先生亦以为今后我们虽仍可继续撰写论词之文稿，以备日后出版《词说》之续集，但却已不必拘守以前所约定的结合论词绝句之形式，而可以各按自己之心得与兴趣采用不同之方式来撰写。那时恰好有《光明日报》的几位编辑先生，要我为他们的《文学遗产》撰写专栏短稿，于是自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我遂为《光明日报》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短稿，题名为《迦陵随笔》，有心引用了一些西方文论如符号学、诠释学、及接受美学等论点，来对中国传统的词学做了一些反思的探讨。不过，这一系列短稿却并未收入这本《词学古今谈》之内，那是因为自从这些短稿发表后，就曾经有友人建议，以为我应将这些短稿所涉及的内容改写为一篇长篇论文，那就是现在收入本书之内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光照中的反思》一篇文稿。而自兹以后，我遂一连写了数篇用西方文论来探讨中国词学的文稿。而与此同时，缪先生则以其深邃之旧学，继《词说》所写的对唐宋之词与词人的论述之后，更陆续撰写了以对金元以来之词与词人之论评为主的一系列文稿，计共有十三篇之多，虽然每篇之篇幅不长，但却皆为先生读词有得的赏心贵当之言。以先生行文之精简与我之冗杂相对比，从表面看来，其内容与风格当然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不复似以前所合撰的《词说》一书之体例与风格之相一致。当我最初将自己所写的这些冗杂的长文寄奉先生求正时，原以为或者将为先生所不许，岂意先生读了我这些引用了西方文论来探讨中国之词与词学的冗杂之长文后，不仅未曾斥以为荒诞不经，反而来函极致赞许，以为《反思》一

文“采取近现代两方新的文学理论，反照中国词学，发抒创新之见，可谓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又以为《词学困惑》一文“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融合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反观《花间诸词》，创发新义，探索秘奥，确实是一篇杰构。”对于先生的过誉之言，我自然愧不敢承，然就先生言，于此乃益见其识见之通达与胸襟之开阔。盖以先生平日论学即主张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又曾提出几种结合之论，以为当以文史相结合，史论相结合，古今相结合，中外相结合。因此先生早年所撰《诗词散论》一书，即曾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将中国之学者与西方之哲人相并论，又曾在其《论词》一文中，将中国历代之诗赋词曲与西方各类风格不同之诗歌相比较。盖以中国文学批评之拓展固原有待于旧学新知之贯通与融会，先生固应早在四十年前就已有了此种博通之识见，是以我所撰写的融用西方文论的长文，就外表言虽似乎与先生之作风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若就我所致力之方向而言，则固当亦为先生内心所课许者也。因将此书命名为《词学古今谈》，一方面固由于所收录之內容有以古今中外相融会结合之意，另方面也希望改为此一合乎时俗之书名以后，或者能使其较之前所出版的《灵谿词说》一书之不合时宜者，能在各地新华书店中得到较多的征订册数。

不久前，出版者来函要我为此书写一序言，而目前我正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手边无一篇原稿可资为写序时之参考凭藉，因此乃只能简单叙写此书虽为《词说》之续篇，然而却在书名及内容体例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变的原因及经过如上。是为序。

最后还有一点要加以说明的，就是今年十月四川大学将为缪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的寿庆，希望此书能赶在寿庆之期出版。书稿编写后原曾函询《词说》之原出版者上海古籍是否愿出版《词说》之续集，俟接复函之虽极愿出版此书，但因出版任务过重，积压稿件甚多，无法赶在缪先生寿期出版。而当时适有湖南岳麓书社及台北国

文天地两家出版社，曾先后致函给我及缪先生商谈出版之事，遂决定将此一书稿交付两家出版社，并承两家出版社热心承允将赶在本年十月缪先生寿庆之期出版。我在此谨向两家出版社表示感谢，并藉此祝贺缪先生的九十华诞之庆。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
写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目 录

• 缪钺撰 •

- 1 词品与人品——再论晏几道
- 13 陈师道词论与词作述评
- 21 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
- 30 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
- 46 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
- 55 论高观国词
- 65 论汪元量词
- 78 论王清惠《满江红》词及其同时人的和作
- 86 论金初词人吴激
- 95 论元好问词
- 121 论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
- 132 常州派词论家“以无厚入有间”说诠释
- 138 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 莉嘉莹撰 •

148 论陈子龙词

——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

182 论纳兰性德词

——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

216 论王国维词

——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的评赏

268 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光照中的反思

314 从一个新论点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

325 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

词品与人品——再论晏几道

1982年6月,我写了一篇《论晏几道词》(先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后来收入《灵谿词说》中),论其词兼及其为人。后来,与我合撰《灵谿词说》的叶嘉莹教授于1983年8月又写了一篇《论晏几道词在词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是先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四期,后收入《灵谿词说》),对晏词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文中将晏几道词与《花间集》及李煜、晏殊、秦观诸家词作了比较衡量,认为,晏词虽然辞句妍美,情事动人,能引起读者之爱好,但在意境方面缺少感发力量,不能兴起深远之体悟与联想。此文对于我很有启迪之益。不过,从词品与人品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晏几道还有可以进一步探索讨论的,所以我又写此文。

现在我们先讨论晏几道的为人。晏几道字叔原,宰相晏殊之幼子,生活在北宋中后期,与苏东坡同时。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晏几道之为人是很特殊的。古所谓“士”,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士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于春秋末期。当时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以官府之学的《诗》、《书》、礼、乐传授弟子。孔子是没落的贵族,他的弟子们出身也各自不同,总起来说,他们形成为一个士的阶层。他们本身;非官,非农,非工,非商,其出路主要是求仕,求仕不得则

教书(孔子即如此)。秦汉以后的士承继这个传统,都是要“学而优则仕”。不过,士之求官,又分上下两等层次。上焉者,有政治抱负,想济世安邦,建立功业,则必须取得政治地位才能施展,如北宋之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是也。下焉者,即是为的作官之后,便予以权谋私,享受富贵,如北宋人所谓,中状元即“一生吃着不尽”,某个官僚所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一类人数量相当多,皆卑鄙不足道,而祸国殃民者亦往往出于其中。

如果结合到晏几道来看,怎么样呢?他也是士,但是他不想求官。因为从上一等层次来说,他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可能他自觉无此才能。从下一等层次来说,他也不贪图荣华富贵。他是宰相之子,本来就生长于荣华富贵的家庭之中,不必外求;晚年家境衰落,“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黄庭坚《小山词序》),他又是能安贫的。所以他平生淡于宦情。

宋代士人求官,主要是通过科举,即是考取进士。晏几道既然不想作官,所以他未尝应科举考试(以他的才学,如果应考,肯定是有中第的)。但是他是宰相之子,又不能作一个大梁布衣,所以他还是要接受官职。宋代有一种门荫制度,凡是大官的儿子,都可以任子授官。晏几道大概是以门荫入仕的,曾作过几任小官,如监颍昌许田镇、通判乾宁军、开封府推官等(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陈尚君《晏几道生平零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一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权贵之门。”可见他对于作官是并不热心的,所以未到退休年龄(古制,七十致仕)即致仕了。

晏几道之沉沦下僚,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并非受到排挤。相反,如果他想在仕途中飞黄腾达,倒是很容易的。他父亲晏殊居高位作宰相多年,身歿之后,其门生故吏仍多在朝掌权者,他们怀念旧恩,都想提拔这位故相的郎君晏几道。但是晏几道禀性孤介,是

不能应付官场的。黄庭坚为晏几道《小山词》所作序中说：“晏叔原，临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轻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称赏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这就是晏几道的特操。

有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晏几道是如何天真任性，不善于敷衍官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载一事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夏著《二晏年谱》考定此事在元丰五年（1082）。“韩少师”即韩维，韩维从晏殊游甚久，故自称“门下老吏”。晏几道以监镇小吏居然敢将平日所作的“侧艳”之词上于本道长官，无怪乎蒙“才有馀而德不足”之规诫。但是以晏几道“不受世之轻重”之态度，当然也不会介意于此的。

晏几道厌恶官场贵人之心情，甚至于达到偏激的程度。夏著《二晏年谱》引《砚北杂志》载邵泽民云：“元祐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夏承焘先生谓此事盖在元祐初年苏轼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时。当时苏轼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名，许多士人愿交而不能得，但是晏几道却因为苏轼位居翰林学士的要职，而拒绝与他相识。

因为晏几道的个性，所以他平生交游范围很窄。根据文献考察所得，与晏几道相知最深者只有两人，即是黄庭坚与郑侠。黄、郑二人都是沉沦下僚者。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以下简称《黄集》）中有涉及晏几道

者数事，可以考见晏之为人，夏先生所撰《二晏年谱》偶未检及。《黄集》卷二十三《王力道墓志铭》谓力道之兄将葬其弟时，谋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临川晏叔原几道、豫章黄鲁直庭坚，将属叔原序其文，而属鲁直铭其墓。”黄撰王力道墓志今存集中，而晏撰王力道文集序已失传。《黄集》卷二十五《书吴无至笔》谓：“有吴无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时，余尝与之饮，饮间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侠也。今乃持笔刀卖笔于市。问其居，乃在晏丞相园东，作无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文中称晏几道为“豪士”，说明其为人纵弛不羁，而其酒客吴无至，虽是一个笔工，居然能臧否士大夫，也颇有侠气，故黄庭坚以“酒侠”称之。《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有《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同王稚川晏叔原会寂照房》、《次韵叔原会寂照房得照字》数诗，可见黄庭坚常与晏几道作诗唱和，可惜文中所提到的晏所作诸诗均不传。黄诗中有“晏子与人交，风义感激昂”之句，可见晏几道是笃于风义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为晏几道的词所作的《小山词序》（《黄集》作《小山集序》，见卷十六）中论及晏几道之为人曰：

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

黄庭坚这一段话，举出晏几道的四“痴”，似贬而实褒，能点出晏为人的特点，不愧为知己之言。

晏几道与郑侠之友谊，不是以文章相知赏，而是政治观点的契合。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少时受知于王安石。他中进士后，为光州法曹参军。熙宁七年（1074），郑侠秩满入都。因为他在外地作官时，目击新法之弊，到京后，数次上书于王安石，言新法之为民害

者。王安石不听。后来郑侠受职监安上门，绘《流民图》，并具疏陈新法之弊，上奏于神宗。神宗很受感动，遂命废止一部分新法。新党吕惠卿等大怒，对郑侠进行迫害，并穷治其平日往还厚善者，晏几道也受到株连。赵令畤《侯鲭录》卷四记其事云：

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晏几道叔原皆在其中。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能几时？”裕陵（按，指宋神宗）称之，即令释出。

从这件事看来，晏几道平时与郑侠往还厚善，并曾作诗相赠。晏几道这首绝句诗是对新党权贵的讽刺。他用托喻之法，说新旧两党之争如同在场上比赛筑球（筑球是宋代流行的一种球艺竞技比赛，参加者分两队以争胜负。《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书均有记载）。他自己是“支颐”旁观者，并不介入。后二句是说新党贵人也不过是春风过客而已，他们之“主张繁华”（按，“张”读去声，“主张”即主管之意，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引此诗作“主管繁花能几时。”），亦就是当权执政，能有多久呢？恐怕很快就会消逝了。晏几道虽不介入政治，但是关心政治，他冷眼旁观，认为新法执行不善，对新党权贵也深为不满。这点与郑侠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晏几道受到株连之后，幸而神宗是明白的，还称赞他的诗，开释了他。郑侠终于被免职，编管汀州。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郑侠《西塘集》条所载，吕惠卿之陷害郑侠，还有深一层的用意：“由吕惠卿欲倾王安石，而侠与安国（按，安国是安石之弟）游从厚善，遂起狱并陷之。”原来吕惠卿还有借此倾陷王安国以株连王安石的阴毒之计。王安石缺乏知人之明，最初非常信任吕惠卿，加以奖拔，使居高位，后来吕惠卿向神宗进谗言，欲取王安石而代之。王安石知道后，晚年痛恨吕惠卿，然已晚矣。所以陈振孙又说：“安石亲惠卿而疏侠，岂惟误国，亦以危身，后之君子，可以鉴矣。”

晏几道《小山词》中之内容无有涉及政治者，但是他仅仅流传的六首诗中，则多有政治内容。《与郑侠》一首，上文已说明了。另一首《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诗云：“眼看飞雁手携鱼，似是当年绮季徒。仰羡知几避矰缴，俯嗟贪饵失江湖。人间情绪闻诗语，尘外高踪见画图。三叹绘毫精写意，慕冥伤涸两踌蹰。”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晏几道对官场中营谋私利，争逐倾陷的鄙视与恐惧。他虽不介入政治，但是对于当时的政治是能透视到其深处的。这是晏几道为人的另一方面。

晏几道虽然厌恶官场，不肯一傍贵人之门，但是他终究是宰相之贵公子，又绝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隐居田园，与素心人共晨夕，他仍然得居住在繁华浩穰，争名夺利的汴京之中。那么，他向何处寻找一片干净土以躲避嚣尘呢？晏几道终于找到了一片干净土。他有两位友人：沈廉叔、陈君龙。二人事迹不详，大概都是家境宽裕而又不乐仕宦，居住汴京，“大隐隐于朝市”者。沈、陈二人家中都有几个歌女，名曰：莲、鸿、蘋、云。晏几道常在沈、陈家中饮酒听歌。莲、鸿、蘋、云这几名妙龄歌女，聪明有才艺，能弹、能唱、能舞，又都是天真淳朴，没有沾染流俗的名利思想。晏几道觉得与她们在一起盘桓，心情清静悠闲，胜于在官场中敷衍贵人。晏几道的许多词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作出来的，而且作出后，付诸歌女歌唱。他自撰的《小山词序》（晏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中说得很清楚。其文云：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馀，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乐，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按，此处“而”字是句末语

助词，同“尔”）。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竊易。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辑成编。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垝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晏几道传世之文只有这一篇，而且写得很好，故全录之。这篇文章中说明，他作词的环境是在沈廉叔、陈君龙家，听莲、鸿、蘋、云诸歌女“品清讴娱客”时所作，每得一解，即付歌唱，“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而其内容则是，“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最后写到，陈君龙疾废，沈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后来为高平公（按，指范纯仁，据夏承焘《二晏年谱》）缀辑成编。最后一段感叹说：“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垝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全文着墨不多，而意境凄美，极能动人。我每读《小山词》，玩味其中情事，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所描述的贾宝玉在大观园中与晴雯、芳官诸少女相周旋的情况；而晏几道的《小山词序》亦仿佛曹雪芹写《红楼梦》在开卷时追忆往事的凄凉心情。我这样说，读者或不至于认为是拟于不伦乎？

如上文所述，《小山词》的内容是狭窄的，但是感情是真挚的，因为晏几道对于这些天真的妙龄歌女，既无须说官场的敷衍话，也不必有文士的门面话，可以称心而言，自然流露。下边我们举几首词为例：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蝶恋花》）

欲论心，先掩泪。零落去年风味。闲卧处，不言时。愁多